

高平 著/敦煌文艺出版社

致诗友



I227
636

致诗友

高平

敦煌文艺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 06 号

责任编辑：符红霞、曾琪

封面设计：刘惠星

版式设计：魏秀琴

致诗友

高平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张掖地区河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26,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25

ISBN 7-80587-144-2/I·129 定价：5.80 元

代序

高平是知名诗人。他的诗论也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和诗歌艺术的探讨，一类是对新诗现状和未来走向的考察，还有一类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

在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和艺术探讨方面，高平写了不少随感和新诗话。这些随感，所论范围较广，笔调轻松，意味深长，不乏真知灼见。如像“不要拾到一块砖就动手去盖一座楼；不要得到一个好句子就硬去凑成一首诗”；“突破不只要求和前人、别人不同，而且要求胜过和超过他们”等片言中肯、一语中的精辟之论，不胜枚举。这些精采的议论，给人以启迪。高平对诗歌艺术的探讨，常常表现出独立思考的精神。他不满于关于诗的现有种种定义，而提出诗的“三高”说，即“诗是诗人对于高层次的客观事物通过高档语言所作的高度个性化的表现”。他对“高层次的客观事物”、“高档语言”和“高度个性化”，有自己的理解。这定义也不失为一家之言。

作为一个诗人，高平始终关注着诗歌创作的现状。他写下了《新时期的新诗及其未来》、《诗之河·涨水期》等一系列文章。他认为所谓诗的“新”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感觉上的新；第二个层次——事实上的新；第三个层次——本质上的新，即从第

二个层次中筛选出来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内涵。由这三个层次的内涵出发考察近年来的诗歌创作，就形式和表现手法而言，它的“新”都是属于第一个层次的；内容的变化较之形式和表现手法要大，但大多都不能划入第三个层次。所以他认为新时期的新诗并不怎么新。新诗的前景由新诗自身和国情民情两方面决定。他作出综合判断，新诗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并不美妙，即将进入一个“寡情期”，诗人和诗将面临最大的、长期的、普遍的危机。他希望诗人以自己的热情影响诗的“寡情”，以避免出现“国家有幸诗不幸”的反差。

高平的诗论是他写诗、读诗经验的升华。他的主张，他对诗歌创作现状的针砭，无不与自己的创作经验相关。他的文章大多都是纵意而谈，不受拘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所论所议都是从心底掏出来的真话。文风坦率真诚，文笔生动活泼，幽默风趣。他的诗论又很注重形象性和具体性，《诗之河·涨水期》完全是形象化的议论。又如对诗与非诗界限的划分，“进了村子不用问，大小石头都姓孙”是诗；“姓孙的一家地主，霸占了全村的一切”不是诗，把繁复的理论问题具体化。这种轻松活泼的文风是对中国传统诗论的继承。

——摘自《西部风情与多民族色彩——甘肃文学四十年》一书第十章第二节《诗歌评论》（红旗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

目 录

- | | |
|----------|-------------------------------|
| (1) | 代序 |
| 第一辑 学诗之路 | |
| (3) | 我学习写诗的道路 |
| (13) | 诗歌《打通雀儿山》的创作 |
| (16) | 我是唱颂歌长大的 |
| (21) | 感情·生活·藏族题材 |
| (25) | 诗与生活 |
| (30) | 两种景物触诗情 |
| (34) | 自我泄密 |
| 第二辑 诗人相重 | |
| (38) | 饶阶巴桑印象 |
| (45) | 《石烛》之光 |
| (47) | 伊丹才让的近期代表作
——评抒情诗《母亲心授的歌儿》 |

- (54) 喜马拉雅山上的珊瑚树
——读藏族诗人丹真贡布的诗集《羚之街》
- (57) 喜读《月夜，在拉萨河畔》
- (60) 就《我说……》我说
- (63) 致邵燕祥
- (67) 《兰州青年报》诗苑漫步
- (70) 民族诗花浅赏
——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获奖诗歌巡礼
- (74) 五朵诗花
- (80) 未出墙的红杏
——读王国虎的诗
- (82) 山水诗三题
——孔孚山水诗举例谈
- (90) 致匡文留
——读诗集《西部女性》随感兼序诗集《情人泊》

第三辑 诗风诗艺

- (97) 招魂
- (99) 新诗的命运
- (103) 和少年朋友谈诗
- (105) 答少年诗歌爱好者
- (107) 对一首诗的基本要求
- (109) 诗也需要细节
- (114) 谈诗二题

- | | |
|-------|----------------------|
| (116) | 致诗友
——关于诗坛的不正之风 |
| (119) | 致诗友
——二谈关于诗坛的不正之风 |
| (121) | 对诗歌创作的几点看法 |
| (125) | 诗，退居二线 |
| (128) | 关于诗的作用 |
| (132) | 诗——浓缩的文学 |
| (134) | 诗·外冷内热 |
| (136) | 主人感——社会主义诗歌的光源 |
| (142) | 匈牙利诗歌琐谈
——访匈札记 |
| (144) | 诗歌创作基本规律初探 |
| (149) | 把诗当诗来评 |
| (153) | 诗之河·涨水期 |
| (155) | 新时期的新诗及其未来 |
| (162) | 诗歌表达情思的五种方式 |
| (168) | 万物的对称性与诗歌的格律性 |
| (172) | 老子是一位诗人 |
| (175) | 《易经·贲卦》与诗的美学 |

第四辑 古诗赏读

- | | |
|-------|--------------|
| (183) | 《秦妇吟》的现实主义成就 |
| (189) | 清人咏藏诗词 |
| (200) | 唐诗我解 |

- (200) “朱门酒肉臭” 辨
- (201) 再“推敲”
- (203) “孤烟”到底指什么
- (205) 花鸟也恋少陵心
- (206) 寻味“陇头梅”
- (207) 怪现象·感情色彩
- (209) 不言思归 却道催回
- (210) 阿Q的祖先
- (211) 化虚为实 反无诗味
- (212) 从海燕不是海燕谈起
- (213) 哀黄昏？颂黄昏？
- (215) “寒士”一案：为杜甫辩护
- (216) 柳花非柳絮
- (217) “杵声”析
- (218) 多余与不多余
- (219) 不可取的斧正
- (221) 休要揭掉洞庭秋夜的面纱

第五辑 诗的随想

- (225) 诗话一六〇则

第一辑

学诗之路

我学习写诗的道路

提起写诗，我想有两个要求：一是我国有九亿多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对诗歌创作，应有很大的数量；二是我国见诸于文字记载的诗，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鲁迅曾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因此，现在做诗，应有更高的质量。

我虽然写过一些诗，但在诗歌作者队伍中，我只是个老兵，回顾一下我这个老兵所走过的写诗道路，也是很有意义的。

—

我的童少年时期，是在农村度过的。

“光明奶奶，爱吃韭菜；韭菜不烂，爱吃鸡蛋。……”（在我的老家，把月亮叫做光明奶奶，太阳被称作老爷爷儿。）这首童谣，在我的记忆中，算是我接触到的第一首诗了。它的明快简练的短句，它的通俗朴实的语言，它的拟人化的手法，它的押韵和转韵，它的跳荡的想象，在我幼小的心灵上产生了魅力，播下了诗美的种子。

我母亲是一位清末秀才的女儿，缠过小脚，念过几年书，她

能背诵《唐诗三百首》里的许多诗。她常常一边做针线，一边吟诵。我伏在炕沿上静静地听着，不懂的地方就请她讲解。我为古诗的音乐性和深远的意境所迷住。

每到冬闲时间，村里就来个说唱西河大鼓的艺人，晚饭一过，男女老幼围在街上，连续几个夜晚听他说书。我总是第一个坐在靠他最近的地方，最后一个回家，从头至尾神情专注地听着。一盏油灯摇曳着，一把三弦回响着，和着农民的赞叹声，汇成了另一番意境，那些长长的有韵的故事，扩大了我写诗的视野。

只听说书，不能满足，我还看些唱本。这些唱本，用大体整齐而又比较自由的韵律，描述了许多场景，各色各样的人物，娓娓动听，很使我喜欢。记得当我读到写岳飞在风波亭上被害的诗句时，竟放声大哭起来，母亲劝我几次都不去吃饭。但也感到它们有个显著的缺点，就是因韵害意和因凑顿数而不精炼。为了押韵，常常生造一些似通非通的词组。如说马，就有“马走龙”、“马走战”、“马能行”之类；说地，就有“地流平”、“地平川”、“地当阳”之类。所以，用说唱体写诗，要写得精炼，字字不废，是很难的。

抗战时期，日伪军来扫荡，这一切就全被破坏了。但另一种诗又出现了，这是一种强烈地打动人心的现实的诗。我们钻在秫秸后面，听表姐悄声唱“左手拿着个瓢哇，右手把婴儿抱，举家逃难就把那饭来要。……”随着鬼子的枪声，耳边也常响起八路军工作组来教唱的歌曲：“老乡们，老乡们！大家要想把命保，快快参加八路军！”这时候，我也写了四句怒斥日伪军残害人民的诗，虽然大体上像七古，实际上只能算作大鼓词或顺口溜，不料，我父亲大加赞扬。这大概是在我十岁那年，算是我写的第一首诗吧。

在这期间，我也受到第一次批评，它对我的影响，永远超过

受到的第一次赞扬。

我在小学的语文（那时叫国文）课本上，读到了新诗，记得是胡适之和周作人的。我开始试着写起新诗来。有一首，被父亲寄给山东大学中文系教师刘泮溪（刘是我的姐夫）去鉴别。记得诗中有“夜莺在歌唱”的句子，刘泮溪在原稿上加了一句引而不发的眉批：“你见过夜莺吗？”

我看着寄回的诗稿，琢磨着这句批语的含意，感到十分羞愧。是的，我哪里见过什么夜莺？更没听说过它的歌唱。我为什么写它呢？又为什么这样写呢？这已经不是什么模仿，而是一种脱离生活的无病呻吟了。这件事，我始终未忘。我感到写诗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尽可能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当然必要时也得用间接生活。

二

我在 40 年代后半期在济南上中学的几年中，阅读了大量的五四时期与 30 年代的新诗和外国古典诗歌，我入迷了，读了一本又一本。上课的时候，我在桌前高高地堆起一些书，像道城墙，用以挡住老师的视线，墙的后面，则是我正在读的诗。对此，数学老师曾经当众宣称：“如果不听我的课，就公开声明，到时候我奉送你六十分。”我毫不犹豫地声明接受他的赠送。此后若干年中，我深感数理化方面的知识太差，对于创作是无益的。所以，青年时期，特别是在校的文艺爱好者，一定要学好基础课，过早地过分地求专是不好的。对于创作来说，全面的艺术修养和全面的知识修养都是十分需要的。

那时期，我写了不少新诗，有时甚至一天写好几首，正如严

羽所形容的“起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意而成”；大部分是写给自己和三五个同学看的，作为练习。这些东西，在思想上，反映了政治的幼稚、糊涂、苦闷、彷徨；在艺术上，也大都跳不出模仿。即使如此，也遭到“同学”的告密和监视，训育主任的恐吓与申斥，书刊常被搜查。父亲苦苦劝我不要做文人，给我讲文字狱的故事，终不能使我稍稍放弃对于文学和诗歌的爱好与染指。

三

1949年8月16日，我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战斗剧社戏剧队，以第二名被录取。我喜欢演戏，更喜欢文学，剧社有个文学队，只因为我没有大学毕业的文凭或资历而不能报考。但进了剧社不到一月，我拿着一首诗和一篇散文到文学队去“毛遂自荐”，不料被立即录用了。紧接着，开始了连续向西北、西南的漫长行军。崭新的战斗生活，在我心中播下了真正的诗的种子。

我们文学队的政治协理员、诗人魏风同志，向我们介绍了陕北的信天游和民歌体的新诗。我深深爱上了信天游，说实话，对于任何好诗的喜爱，都没有使我减弱过对于民歌的喜爱。10月，在山西霍县，我写的第一首歌颂新中国的诗，就是用信天游的形式写的，记得登在一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油印小报上。

我所发表的第一首叙事长诗，是在刚解放的成都《川西日报》上，题目叫《天下穷人一条心》，连载了两天，也是用信天游的形式写的。当时该报编委西戎同志约见我时大为惊讶，他说：“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同志呢，原来是个娃娃！”他的意外，使我受到了鼓励，说明我对于民歌的学习和运用有了成效，使我认定自

己的路子是正的，应当由此前进。

在这前后，我还大量地接触到我国40年代的新诗歌，艾青、李季、田间、贺敬之、阮章竞、柯仲平、张志民、毕革飞等人的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诗具有民族气派，并从民歌中汲取了大量营养，不少篇章使我感到清新、亲切，为我在过去所读过的古诗、外国诗、五四时期的诗、国统区的诗之外，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四

我在学习写诗的道路上，完全用自己的双脚迈步前进，是到西藏以后。

西藏，是我的缪斯（诗神），是我的第二故乡。对于它，我是一见倾心的。我把青春献给了西藏；西藏也给了我永久的青春。

它的翠蓝得透明的天空，它的洁白得耀眼的雪峰，它的有时像哈达有时像海浪的云层，它的五彩缤纷香气醉人的原野，它的绿得发黑的插天的青松，它的清澈见底而又激情不息的河流，都使我如痴如迷。

它的悠久的历史和珍贵的文化，它的别开生面的绘画、雕塑、建筑，它的质朴明朗健康优美的歌舞，唐代的甥舅联盟碑，文成公主种下的柳树，日夜演不完的藏戏，抗击帝国入侵的炮台，都使我增添了对于中华民族的自豪。

最使我亲爱的，是西藏人民。他们勇敢英武，吃苦耐劳，善良淳朴，忠诚好客，热爱祖国，笃信友谊，能歌善舞，是一个诗的民族。

然而，它的制度，却是最残酷、最落后、最野蛮的。反动的

三大领主，用皮鞭、锁链和各种刑具制服着农奴们的肉体；用愚昧、宿命和各种欺骗制服着农奴们的灵魂。这样美的土地，这样善良勤劳的人民，竟长期地被笼罩在中世纪的黑暗中。

无数经历了南征北战的指战员，千千万万来自内地的战友，那些在西藏落了户的老同志，埋在雪山下的含笑的忠骨，使我一想起来，浑身的热血就在燃烧。进军西藏，建设西藏的英雄业绩，藏族人民的斗争经历与新的生活一直是我的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

我是在十九岁那年，作为一个青年团员，主动要求到西藏去的。我有幸参加了西藏的进军，并且在西藏工作了多年。虽然，出于一个毫不自愿的原因被迫离开了西藏，但我是西藏的永不变心的情人。

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到诗歌的社会作用和力量，是在写出了《打通雀儿山》之后。这首歌是歌颂修筑康藏公路的部队的。当时，只想为文工团出个节目，没想它竟无翼而飞，不胫而走，一时传抄学唱，转载于西藏和内地，并制成唱片，两次获奖。开始，人们并不知道作者的姓名，是作为“解放军战士诗”来发表的，这给了我很大的欣慰。的确，其中吸收了经过加工提炼的战士们的顺口溜（属民歌范畴），而且运用了五七言的句型。

1954年，我的诗（就是《打通雀儿山》和其他几首）第一次被公开评论，是在冯牧同志的一篇文章中。50年代前期，我作为《解放军文艺》特约撰稿人，主要诗作都是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1954年，马寒冰同志来信提出要为我出版一个集子，他当时是总政文化部编审出版处处长。在他的鼓励和催促下，我将二十首习作编成了第一本诗集《珠穆朗玛》，第二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印出。1957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第二本诗集《拉萨的黎明》，这本诗集印数不多，质量也不齐。